

日本在朝鲜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探析

——以20世纪10年代为中心

曲波

(哈尔滨理工大学 朝鲜语系,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日本强制吞并朝鲜后,以《朝鲜教育令》为基本法令推行殖民主义教育。为了培养殖民地统治的顺民,日本统治者对朝鲜人民进行了泯灭其民族性的同化教育以及低级简易的愚民教育。然而,殖民者的最终目的是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培养下级劳动者的实业教育也受到殖民当局的重视。面对残酷的殖民教育,朝鲜人民在国内外开展民族教育,向朝鲜青年传播爱国思想和民族独立意识。

关键词:日本;朝鲜;《朝鲜教育令》;殖民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9.3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14)01-0086-07

收稿日期:2013-11-04

基金项目: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AKS-2009-MB-2001)

作者简介:曲波(1983-),女,辽宁朝阳人,哈尔滨理工大学朝鲜语系讲师;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在读博士。

1910年8月《韩日合并条约》签订以后,日本正式开始了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为了实现对朝鲜的永久占有,日本统治者不仅推行野蛮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掠夺,还试图在精神上麻痹和控制朝鲜人民,以从根本上消除其民族精神与独立意识。由此,教育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11年8月,朝鲜总督府发布第1次《朝鲜教育令》,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教育全面展开。20世纪10年代是日本强制占领朝鲜后殖民主义教育政策的初步推行阶段,奠定了之后三十多年殖民教育的基本论调,此后的殖民教育政策虽有变化,但都是在这一时期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改与调整。考察这一时期日本对朝鲜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有利于揭露日本推行的殖民教育的本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日本在朝鲜殖民统治的基本面貌。

一、《朝鲜教育令》与日本在朝鲜殖民主义教育基本方针的确立

(一)对朝鲜教育行政体制的整编

日本强制占领朝鲜后,实行野蛮的武断统治,为了彻底泯灭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反抗意识,尤其重视利用教育对朝鲜人民进行“忠良臣民”的教化。1910年9月15日,日本杂志《教育时论》发表题为《新领土的教育》的社论。该社论指出:“引导新臣民(朝鲜人——笔者注)、使其成为陛下忠良臣民的方法,即把其同化为旧臣民(日本人——笔者注)的方法有多种,但主要是教育。”^[1]另外,朝鲜总督府在《施政二十五年史》中提到:“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决定着半岛统治的兴衰。因此,在半岛实施新的总督政治时,要进行更为慎重的研究”。^[2]为此,朝鲜总督府在对各部门行政机构进行整备的同时,也对教育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整编。

根据 1910 年 8 月 29 日和同年 9 月 30 日先后颁布的《对朝鲜总督府设置的敕令》以及《朝鲜总督府及其所属官署官制》的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置总督府,由总督管辖朝鲜。在教育方面,朝鲜总督拥有绝对而广泛的权力,大到教育相关法令的制定,小到教科书的编定。作为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学务局,是总督府下设内务部的直属部门,负责辅佐总督管理相关的教育行政事务。学务局下设两科,分别是学务科和编辑科。学务科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各级学校的教育行政事务,并对其进行监督。科内设有一名视察官和数名督学,他们不定时地视察朝鲜各道、府、郡等地的学校,督促校长、教员执行总督府的教育政策。这些人不仅对各级的官、公立学校进行视察监督,而且对朝鲜人自己设立的书堂也不放过。编辑科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各级学校使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并且对教科书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科内设有一名编修官和数名编修、书记员,他们对官、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的教科书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强制使用总督府发行的教科书或经过总督府“检定”的教科书。

关于地方的教育行政,总督府没有在地方设置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了便于中央直接控制地方教育,总督府虽然对地方的道、府、郡、面等行政机构进行了精细的整顿,但没有设置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

(二)《朝鲜教育令》的颁布

1911 年 8 月 23 日,朝鲜总督府正式颁布了第 1 次《朝鲜教育令》。《朝鲜教育令》是日本在朝鲜进行殖民教育的基本法,明确了日本统治者在朝鲜

进行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并确立了殖民教育的基本体系。

1. 明确殖民地教育的培养目标

教育令第 2 条规定:依据《教育敕语》之主旨,培养忠良之国民。^[3]所谓《教育敕语》,是日本天皇在 1890 年颁布的关于教育的诏书,服务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其宗旨成为日本战前教育的主轴。“培养忠良之国民”,表面上把朝鲜人同日本人置于相同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却是让朝鲜人放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成为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国绝对忠诚的顺民,以助于对其进行奴役。《朝鲜教育令》对各级学校教育目的的规定中,都提出了要注重国民性格的培养,这里的国民当然指的是作为日本臣民的朝鲜人。

《朝鲜教育令》第 5 条规定:普通教育教授普通的知识技能,尤其以培养国民性格为目的;第 8 条规定:普通学校对儿童实行国民教育中基础的普通教育,留意其身体发达,教授国语(日语),施予德育,培育国民性格,教授必要的普通知识技能;第 11 条规定:高等普通学校对男子实行高等普通教育,教授其常识,图求国民性格,传授生活中有用的知识技能;第 15 条规定: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对女子实行高等普通教育,培养妇德,陶冶国民性格,传授生活中有用的知识技能。^[3]可见,日本国民性格的培养成为各级学校的主要教育目的,贯穿于整个殖民教育的始终。

2. 确立殖民地教育体系

在“教育要符合时势与民度”的旗号下,日本统治者制定了一套所谓“符合”殖民地实际与发展的教育体系,推行愚民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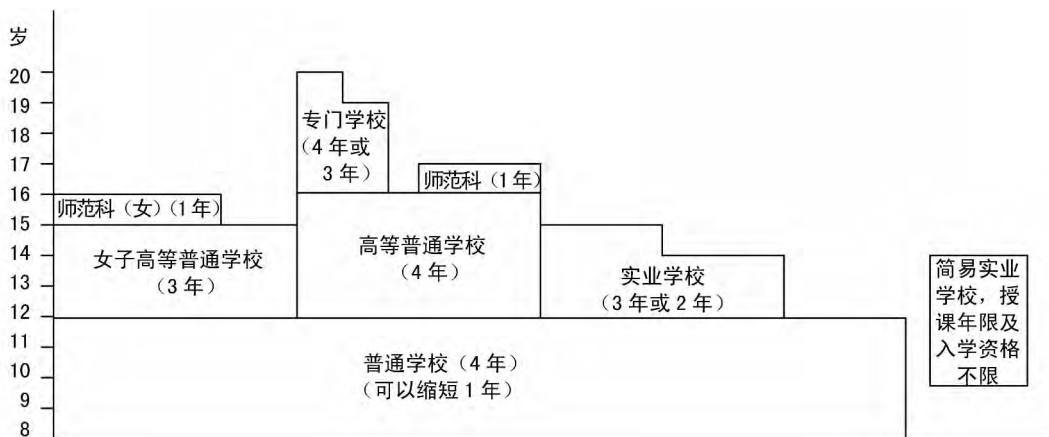


图 1 20 世纪 10 年代朝鲜教育体系一览

图 1 是根据《朝鲜教育令》的规定制作的教育体系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朝鲜教育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第一,普通教育年限被大大缩短。朝鲜人普通教育的年限,即初、中等教育的年限,加起来一共是 6—8 年。早在 1895 年和 1899 年朝鲜颁布的《小学令》及《中学校令》中,就已经把初、中等教育的年限规定为 12—13 年。而同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初、中等教育年限共为 11 年。第二,以专门教育替代高等教育,没有大学教育机构。而与此相比,日本国内于 1877 年设立了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到 1911 年日本已有 4 所帝国大学。^[4]第三,对师范教育的轻视。《朝鲜教育令》中没有规定设立师范学校,而是在官立高等普通学校和官立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分别设立了 1 年的师范科,培养普通学校教员。与此相反,同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师范学校细分为三类,分别是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部分师范学校还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第四,重视实业教育。除了有专门的实业学校外,还另外附设了简易实业学校,而且在教育年限和入学资格上

都没有严格的限制。

总的来说,日本在朝鲜推行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朝鲜人义务上像日本国民一样效忠天皇,服从殖民统治,而权利上却与日本国民区分开来,只能接受与日本国内相比低水平、低层次的教育,成为日本殖民统治被奴役的工具。

二、日本在朝鲜殖民主义教育政策的实施

(一)同化教育

所谓同化,就是通过殖民者的语言文化对殖民地的语言和文化进行渗透,使得殖民地民众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在这样一种扭曲的文化氛围中完成心理、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被殖民过程。^[5]日本统治者通过向朝鲜人强制输入其语言文化、思想道德、历史等,对朝鲜人进行同化。

首先,日本人教师被安排在各级学校中任教。这些教师上课时都身穿军服,佩带刀剑,兼任了宪兵警察的角色。这样不仅有利于对学校教育进行直接控制,还有利于向学生灌输亲日思想。

表 1 1919 年各级学校日本人教师分布情况

单位:人

学校	教师总数	日本人教师数	日本人教师百分比
普通学校	2 525	759	30%
高等普通学校(含女高)	239	145	60%
官立专门学校	66	59	89%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史研究会编,《韩国教育史》,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284 页。

从表 1 可以看出,随着学校等级的提高,日本人教师的比例也逐级提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朝鲜师范教育的水平低,只能培养普通教育阶段的教师;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形成,为防止朝鲜人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宣传民族独立意识与反日思想,所以利用日本人教师对学生灌输亲日思想,削弱其反抗意识。

其次,强化日语教育,扼杀朝鲜民族的语言文化。日语被规定为“国语”,被大量安排在各级学校的课程中,而朝鲜人民真正的国语——朝鲜语,与汉文合在一起上课,降格为普通的语言课。除了朝鲜语及汉文外,日语是所有课程的上课用语,教科书也都是用日语编写。

如表 2、表 3 所示,日语是普通学校所有科目

中课时数最多的科目。1—2 年级每周课时总数是 26 学时,3—4 年级是 27 学时,日语课所占比重分别达到 38.5%和 37%。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中由于增设其他教学科目,导致日语课时数有所减少,但与朝鲜语及汉文课相比,仍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每周日语课比朝鲜语及汉文课的总课时多出了 1—2 倍之多。

表 2 普通学校课程安排与每周上课课时数 单位:学时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朝鲜语及汉文	6	6	5	5
日语	10	10	10	10

资料来源:孙仁铢,《韩国近代教育史》,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71 年,第 101 页。

表3 高等普通学校与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朝鲜语及汉文与日语课每周学时安排

单位:学时

学校	朝鲜语及汉文/日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合计
高等普通学校	4/8	4/8	3/7	3/7	14/30
女子高等普通学校	2/6	2/6	2/6	—	6/18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史研究会编,《韩国教育史》,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日语课不仅课时数量多,而且课上内容也大量充斥了同化教育的内容。例如,在1914年出版的普通学校二年级教材《国语读本》(卷4)的课文题目中,就有“菊花”、“皇大神宫”、“神武天皇”、“富士山”等与日本历史文化相关的内容。其中,《从蛋中醒来的王》一课的内容竟是说朝鲜的新罗王出生于日本人所生的蛋中。通过编造这样的神话,日本统治者试图从历史上证明,从远古时代开始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就具有一体性与从属性,即日本御用史学家提出的所谓“日鲜同祖”论,进而表明日本占领和统治朝鲜的合理性。

最后,利用修身教育,对学生进行“教化”。所谓修身教育,就是思想道德教育,目的是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塑造和培养。对于修身教育的重要性,日本的御用史学家这样评价:“修身课虽然是众多科目中的一个,但实际上可以用这一门课代替所有的科目。教育事业以修身结束,这样说一点不为过。它的意义在于其对教育敕语的实践”。^[6]《普通学校规则》中的“修身应该基于教育敕语的主旨,培养道德上的思想及情操,不失一直以来的良风美俗……主要教授人伦道德,知晓对国家及社会的责任义务,遵守国法,崇尚功德……”^[7]道破了修身教育的根本目的。

由此,朝鲜的各级普通学校均安排了修身课。课上基本都是围绕“勤勉”、“责任”、“实践”、“信义”、“忠君爱国”等内容进行说教,培养学生对天皇的崇拜思想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因此,修身教育既有思想道德教育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政治教育的性质,表面上是提高道德涵养,实际上却是注入殖民地思想理念的政治教育工具。

(二)愚民教育

为了压制朝鲜人的独立思想,同时也为节省财政开支,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教育在体系上是简易和畸形的。日本统治者在进行“皇国臣民”教育的同时,在所谓“教育要符合时势与民度”的旗号下,推行愚民教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缩短普通教育年限。《朝鲜教育令》规定,普通教育由3—4年的普通学校、4年的高等普通学校及3年的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构成。这样,朝鲜的初、中等教育年限加起来一共是6—8年。同一时期,在朝鲜日本人小学为6年制,日本人中学和高等女学校为5年制。这样,日本人小学和中学的修业年限加起来一共为11年,比朝鲜的普通教育多出了3—5年。

普通教育年限的缩短,造成了学生的知识基础薄弱,使朝鲜儿童的升学成为一大问题。由于每级教育之间缺乏连续性,使得毕业生无法继续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从而使普通教育成为一种完成教育。对此,寺内正毅在1912年4月30日给新任日本人教员的训示中说道:“如今在韩国,还没有达到教授韩国人高尚学问的程度。现在应该着眼于实施一种浅显的教育……”^[6]这样,使得朝鲜的教育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然而,就是这种低水平教育的接受权利,朝鲜人民也不能充分享受。如表4所示,在朝日本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远远高于朝鲜儿童。日本人儿童入学率超过了91%,而朝鲜儿童入学率仅为3.7%。这表明殖民地统治下朝鲜人的基础教育不仅水平低,而且教育机会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表4 1919年普通学校学龄儿童入学情况 单位:人

学校	入学适龄儿童数	入学人数	入学率
普通学校(朝鲜)	2 280 950	843 060	3.7%
小学(日本)	46 740	42 732	91.5%

资料来源:李万珪,《朝鲜教育史II》,1991年,第129页。

第二,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所谓“奴隶不能太愚,也不能太智……愚则驱使不灵,太智则操纵不易”。^[5]不智不愚、似智似愚的人才,最利于殖民者的剥削和利用。这一时期日本统治者在朝鲜没有设立一所大学,而是以专门教育代替高等教育。1910年11月号的日本教育专门杂志《教育界》中题为《朝鲜教育制度》一文中这样写道:“拓殖局对

于殖民地尤其是朝鲜的教育制度正在江木部长的领导下进行调查,但大体上的方针就是殖民地统治的政治弊害一直都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这一事实从英国对印度的教育制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因此,对这一点应该仔细斟酌,使教育在不太高尚的范围内实施。”^[1]日本统治者就是考虑到教育这种启发民智的作用,采取刻意降低朝鲜人受教育程度的方式,维护其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专门学校不论是在水平上,还是在规模上,也都处于很低的水平。专门学校的修业年限为3—4年,入学资格为16岁以上的高等普通学校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而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教育中,专门学校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而且在经过普通小学(6年)、高等小学(2年)、中学(5年)的教育后方可进入专门学校学习。

20世纪10年代,朝鲜只有4所官立专门学校,分别是京城法学专门学校、京城医学专门学校、京城工业专门学校、水原农林专门学校。但这

4所学校中没有一所是总督府新设立的学校,基本都是在19世纪末朝鲜王朝或大韩帝国时期建立的学校基础上,于1915年3月颁布《专门学校规则》后,经过改编或升格成立的专门学校。专门学校不仅水平低、数量少,而且不论从教员数量上还是从学生数量上看,专门学校教育并不是以朝鲜人为主的教育,而是为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服务的教育。

表5中的数据 displays,官立专门学校实行朝鲜人、日本人共学制度,但日本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1917年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242名在校生中,朝鲜人只占19.8%,日本人占到了80.2%。京城工业专门学校的234名学生中,朝鲜人占49.1%,日本人依然占了一半以上,为50.9%。在教师数量上,1917年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员全部是日本人,京城工业专门学校中共有教师62人,日本人为58人,占到了93.5%。因此,专门教育对于大多数朝鲜人来说,等于是形同虚设。

表5 1917年京城医学专门学校、京城工业专门学校教师及学生情况统计 单位:人

	教师数			学生数(朝鲜人/日本人)				
	朝鲜人	日本人	合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合计
京城医学专门学校	0	42	42	24/59	24/39	0/52	0/44	48/194
京城工业专门学校	4	58	62	63/64	42/47	10/18	—	115/119

资料来源:姜秉植,《日帝对韩国殖民地教育实态研究》,《汉城史学》,1997年,第9期,第85—132页,第122—123页。

(三)实业教育

在日本的殖民教育体制下,教育不是培养具有综合能力的人才,而是培养一批既顺从殖民者统治,又为其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因此,实业教育成为日本殖民主义教育的另一重点。《朝鲜教育令》虽然规定实业学校有农业学校、商业学校、工业学校与简易实业学校之分,但实际上农业类实业学校是发展的重点,其原因来自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行振兴工业的近代化政策,而商业资本主义的发达必然要求扩大殖民地市场。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经济陷入萧条。由于日本缺乏农业用地,又面临不断增加的人口,因此粮食供给不足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日本急需通过向殖民地倾销工业产品,同时从殖民地输入粮食的方式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因此,日本在朝鲜实行了以高

价工业品换取低价农产品的掠夺政策。据统计,1912年至1919年,朝鲜对日粮食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44.9%增加到57.7%。为了在朝鲜发展农业,朝鲜总督府在1910年3月至1918年11月8年多的时间里,在朝鲜进行了彻底的土地调查,榨取了大量的农林用地。1908年,日本在朝鲜成立了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总督府和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为首的殖民地土地公司及日本人地主成为朝鲜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由于上述原因,日本统治者通过发展农业实业学校,培养农业人才和劳动力,为其剥削和掠夺服务。

如表6数据所示,从1912年4月末到1919年5月末的7年里,在公立的农、商、工实业学校中,农业实业学校的发展远处于优势地位。《朝鲜教育令》公布后仅8个月,农业学校已有15所,而工业、商业学校1所也没有设立。到1919年5月末,农业学校增加到17所,工业、商业学校一共仅

4 所。在公立的简易实业学校中,农业学校的受重视程度更为明显,7 年间从 15 所增至 49 所。

表 6 1912 年 4 月末—1919 年 5 月末
公立实业学校设立的变化情况 单位:所

类别		1912 年 4 月末	1919 年 5 月末
农业学校		15	17
商业学校		0	3
工业学校		0	1
	农业	15	49
	商业	3	6
简易实业学校	工业	1	10
	水产	0	2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史研究会编,《韩国教育史》,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283 页。

日本统治者不仅在实业学校推行实业教育,在普通学校、高等普通学校、女子高等普通学校中也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实业科目。对此,总督寺内正毅 1912 年 4 月在对新任日本人教员的训示中说道:“要把一个人培养成能赚钱的人……在普通学校教育中也有必要注入与实业相关的知识”。^[6]

普通学校中,有关实业的教学科目分别有手工、裁缝及手工艺、农业初步、商业初步。虽然规定根据地方情况这些课不是必修科目,但根据 1914 年的调查,在 383 所公立普通学校中,开设农业课的学校最多,有 261 所,开设商业课的学校有 8 所,40 所学校开设了手工课。^[1]高等普通学校中,实业教育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农业、商业、手工成为必修科目,特别是农业及商业课的课时数,在四个学年中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由第一学年的 2 课时,增加到第四学年的 5 课时。另外,在女子高等普通学校中,每个学年的总课时数是 31 课时,裁缝及手工艺课都为 10 课时,占总学时的比重超过 1/3。

三、朝鲜人民对日本殖民教育的抵抗

面对日本统治者推行的殖民教育,朝鲜人民没有屈服,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民族教育,图求教育救国、民族自强,实现民族独立。

私立学校是朝鲜人民进行民族教育的主要阵地。针对这一时期私立学校进行的教育活动,寺内正毅在对朝鲜各道长官的训示中提到:“各道长官要监视学校(私学)是否遵守法规、教员是否尽职尽责。应该使用旧学部编纂、认可的教科书,但

私立学校往往随意使用这以外的其它教科书。私立学校通过唱歌、运动会等其他形式鼓吹独立,奖励对帝国进行反抗……”^[8]从寺内的训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私学主要通过教授总督府严禁的朝鲜语、朝鲜历史、朝鲜地理等科目,以及以唱歌、运动会等形式,在青少年中开展民族教育。

为限制私学发展,总督府在 1908 年发布的《私立学校令》的基础上,于 1911 年 10 月又发布了《私立学校规则》,紧接着在 1915 年 3 月颁布了《改正私立学校规则》。短短的 7 年中,对私立学校的法规进行了两次修改,足见日本统治者对私立学校问题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朝鲜人私立学校的发展状况。由于总督府的压制,私立学校在数量上明显减少。被日本强占前,朝鲜私立学校超过了 2 000 所,1911 年减少到了 1 467 所。^[9]但余下的私立学校仍然坚持秘密活动,进行反日爱国教育。

书堂是朝鲜人开展民族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教育机构。书堂在朝鲜具有悠久的传统,本是教习儿童汉文、传授儒家思想的旧式启蒙教育机构。也正是由于书堂的这种性质和特点,初期并没有引起日本当局者的注意。当私学受到越来越大的阻碍时,很多爱国人士便把民族教育的视线转向了书堂。

表 7 1912 年 4 月末—1919 年 5 月末官、公立普通学校与书堂情况对比

时间	种类	学校数量	学生数量
1912 年 4 月末	书堂	16 540	141 604
	普通学校	330	42 607
1919 年 5 月末	书堂	23 556	268 607
	普通学校	484	84 767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史研究会编,《韩国教育史》,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282—283 页。

通过表 7 的数据可知,在学校和学生数量上,与普通学校相比,书堂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可见,朝鲜人民为了让子女接受民族教育,与官、公立的普通学校相比,更愿意选择书堂。这一时期的书堂也积极顺应时代的潮流,经过改良,成为初等教育机关,设置学年、学期等,不仅教授汉文、儒家经典,还教授朝鲜历史、地理、朝鲜语、算术等近代知识。

随着朝鲜国内政治、思想、教育条件日趋恶化,大批爱国志士、青年学生纷纷迁往海外,在这

些地区展开恢复国权运动的同时,进行民族教育活动。其中,中国东北地区是朝鲜人在海外进行民族教育活动最活跃的地方。

1905年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后,一些爱国团体和民族志士就来到中国东北,以朝鲜人聚居地为中心着手创办学校,致力于朝鲜民族启蒙教育,各种民族教育机关便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其中代表性的有:李相高在延边龙井村创立的朝鲜族第一所近代民族学校——瑞甸书塾,1908年4月金跃渊等人在和龙县创立的明东书塾等。至1916年末,仅在延边五县(和龙、延吉、汪清、琿春、安图)朝鲜人的私立学校共有157所,学生3879名。^[10]

由于朝鲜人学校创办者多为民族主义人士,因此这些学校的教育内容均倾向近代基础教育和反日民族教育。教学内容以近代指向性的基础学科知识为中心,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实业教育、法律经济教育、外语教育等。以民族主义教育科目为中心,即国语(朝鲜语)教育、历史教育、修身教育、伦理教育、音乐教育、尚武体育教育、军事教育、宗教教育等,所涉及的内容甚广,其中,朝鲜语教育和历史教育尤为各私立学校之必设科目。^[11]正因为这些近代民族教育的开展,培养了一批既具备先进的近代科学知识,也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才,使得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朝鲜族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教育,在反日民族独立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韩]辛堯永. 日帝下朝鲜教育令研究——以第1次朝鲜教育令为中心[J]. 教育研究, 1990, (9).
- [2] [韩]朝鲜总督府. 施政二十五年史[M]. 京城: 朝鲜总督府, 1935. 167.
- [3] [韩]朝鲜总督府. 朝鲜教育令(敕令第229号)[N]. 官报, 1911-09-02.
- [4] 藏佩红. 日本近现代教育史[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148.
- [5] 王智新. 近代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A]. “殖民主义研究第六届年会暨重庆大轰炸65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直面血与火——国际殖民主义教育文化论集[C]. 重庆: 中国殖民地教育研究中心, 2003.
- [6] [日]高桥宾吉. 朝鲜教育史考[M]. 京城: 帝国地方行政学会朝鲜本部, 1927. 401, 365, 365.
- [7] [韩]朝鲜总督府. 普通学校规则(朝鲜总督府令第110号)[N]. 官报(号外), 1911-10-20.
- [8] [日]大叶谦一. 朝鲜教育问题管见[M]. 京城: 朝鲜教育会, 1933. 31.
- [9] [韩]车锡基. 日帝下民族教育与殖民教育的葛藤[A]. 郑在觉. 近代民族教育的展开与葛藤[C]. 京畿道: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1982.
- [10] 朴文一. 1906—1919年间中国东北朝鲜族人民的私立学校教育运动及其历史作用[A]. 延边大学民族研究所. 朝鲜族研究论丛(三)[C].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朴今海. 日本对东北朝鲜族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M].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8. 25.

[责任编辑:张京梅]

Study of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Policy in Korea during the 1910s

QU Bo

(Dept. of Korean Literature,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Dept. of Histor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133002, China)

Abstract: After its all-round aggression against Korea, Japan begun its coloni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hosen Educational Ordinance*. Assimilation education and obscurantist education were widely carried out. Rulers of Japan aimed to eliminate the local people's nationalism and enslave the whole nation with the full exploitation of the country.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Korean people started national education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arouse patriot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the youth.

Key words: Japan; Korea; *The Chosen Educational Ordinance*; colonial education